

## 第三层次议程设置： 萨德事件中媒体与公众的议程网络

蒋俏蕾 程杨

### 摘要

基于萨德事件中我国报纸媒体和公众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通过比较媒体报道与公众认知中的属性网络,本研究分析了作为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的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 NAS)效果。本研究共计收集和分析了680篇新闻报道和538份调查问卷。媒体与公众议程网络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支持了网络议程设置模型。研究表明,网络议程设置模型在隐性和显性层面都显示出了显著的解释力。本文的发现延伸了议程设置理论的最新进展——“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或者“网络议程设置”在非西方语境下的具体应用。

### 关键词

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萨德、隐性公众议程、显性公众议程

### 作者简介

蒋俏蕾,传播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新媒体使用行为、心理与效果,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等。电邮:jiangqiaolei@139.com。

程杨,新闻学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公共关系,传播学理论等,电邮:ycheng20@ncsu.edu。

## The third-level agenda setting: Media and public agenda networks during THAAD event

JIANG Qiaolei CHENG Yang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NAS) effects as the third-level agenda setting with data collected from both newspaper reports and public survey regarding the THAAD event in Mainland China. Networks of attributes in the news repor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ounterparts generated from public opinion. A total 680 news articles and 538 responses to a public survey wer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The NAS model was supported with th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dia and public network agenda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NAS model offere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at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vels.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xte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agenda setting theory, i.e., the third-level agenda setting or network agenda setting research in a non-Western context.

### Keywords

Agenda setting, Network agenda setting, THAAD, Implicit public agenda, Explicit public agenda

### Author

Jiang Qiaole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new media use behaviors, psychology and effects, 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etc. Email: jiangqiaolei@139.com.

Cheng Y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S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theories, etc. Email:ycheng20@ncsu.edu.

## 一、引言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以人类认知结构是线性的作为前提假设 (McCombs & Shaw, 1972)。2011年, 郭蕾和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Maxwell McCombs) 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 (Guo & McCombs, 2011a, 2011b), 集中探讨了接近于网络结构的人类认知结构, 指出一个节点 (node) 可以与很多其他的节点相互连接 (Stephen, 2005)。与议程设置理论的前两个层次一脉相承, 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试图探讨新闻媒体报道中的议题或属性的显著性网络如何影响公众认知中的议题或属性的显著性网络 (史安斌&王沛楠, 2017)。对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 最近传播学者也对其在非西方语境中的信度、效度和有效性进行了检验性的研究, 例如基于韩国、香港和台湾的个案进行的研究 (Cheng, 2016; Cheng & Chen, 2015; Kim & Min, 2015; Wu & Guo, 2017), 但是与中国大陆相关的研究仅出现在为数不多的跨国比较分析中 (Guo et al., 2015; Guo, Mays & Wang, 2017), 目前仍缺乏中国大陆语境下网络议程设置的中文实证研究 (杨璐, 2017)。

本研究以萨德 (THAAD) 事件为个案, 收集了中国大陆媒体的相关报道和问卷调查中公众的相关认知, 旨在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丰富网络议程设置的相关研究。一方面, 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大陆语境下的网络议程设置, 可以进一步拓展议程设置这一源自西方的经典理论在华文传播领域中的发展。本研究响应了传播学研究中应对文化和语境因素给予充分关照的号召 (Curtin & Gaither, 2005; Miike,

2007; Sparks, 郭镇之 & 周庆安, 2015; Whetten, 2009)。很多传播学者探讨过议程设置理论中的条件因素(Kosicki, 1993; McLeod, Becker & Byrnes, 1974; Rogers & Dearing, 1988; Walgrave & Aelst, 2006), 其中国家特征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理论和研究中的重要宏观层面权变因素(contingent factor)(Jochen, 2003)。萨德事件与中国的语境紧密关联, 因而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 尽管议程设置理论已历经50年的发展和演进, 仍鲜有以网络议程设置的视角在中国大陆语境下开展的深入研究。本研究还可以为理解我国公众对于萨德事件的认知及其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关联提供现实的依据, 为提升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公众的接受程度提供可行路径。

## 二、文献回顾

### (一) 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

议程设置的基本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国科学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的金句——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 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异常成功(Cohen, 1963)。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通过开展实证研究, 调查了1968年美国大选前夕教堂山镇选民认知中不同议题的重要性与他们所接触的大众媒体对议题的关注程度, 从而验证了他们关于议程设置的最初假设——媒介议程中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McCombs & Shaw, 1972)。议题显著性从媒体议程传递至公众议程被视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 也被称为客体议程设置(McCombs, 2005)。

随着研究的深入, 议程设置的理论建构获得了进一步拓展。媒体不仅能够设置议题重要性的议程, 还能够影响公众对议题属性的判断, 即属性议程设置, 或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次(McCombs, Llamas, Lope-Escobar & Rey, 1997)。从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 对于特定议题显著性如何从媒体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的理解进一步深化, 媒体不但能成功地告诉公众“想什么”, 也可以成功地告诉公众“怎么想”。

### (二) 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

随着媒体环境的深刻变革,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 不论是客体议程设置还是属性议程设置, 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借鉴了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 郭蕾和麦库姆斯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 即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 简称NAS)。网络议程设置指出公众对于议题、属性, 或者议题与属性二者结合的认知

是类似于不同节点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并非以线性形态排列的(Guo, 2015)。

信息处理模式理论认为,公众可以通过搜索相关的记忆网络中的特定信息并在活动记忆中进行重组来获取信息(Lang, 2000)。网络议程设置借鉴了相关观点,认为最便于获取的信息往往是人记忆网络中与其他信息相互连接的信息。因而,网络议程设置假定媒体具有将新旧信息连接起来的功能,并能够建立和重建公众的记忆网络。现有的网络议程设置研究通过个别国家的个案和多国比较分析,成功发现了媒介网络议程和公众网络议程的显著关联(Cheng & Chan, 2015; Guo et al., 2015; Kim & Min, 2015)。

近几年,网络议程设置作为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热点,除了考察和检验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网络化结构的相关性,学者们还对公众认知网络结构中的隐性关联和显性关联进行了区分和分析(郗艺鹏, 2018; 杨璐, 2017)。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隐性关联与显性关联的区别主要在于公众对特定议题要素或属性关联的反馈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的(Cheng, 2016; Greenwald & Banaji, 1995)。由于媒介信息在公众头脑中进行有意识的信息处理后可能出现传输效果衰减,有研究发现媒介议程与公众隐性议程的关联更紧密(Cheng, 2016; 郗艺鹏, 2018)。

### (三) 萨德事件与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自创建之初,政治相关议题一直是议程设置研究中的重点(Kiousis & McCombs, 2004; McCombs, Lopez-Escobar & Llamas, 2000; McCombs & Shaw, 1972)。史安斌和王沛楠(2017)分析了2013年以来的议程设置研究,发现政治议题仍占据着最高的比重,而议程设置第三层次的具体研究中呈现出关注国际政治议题和跨国比较分析的特点(Guo et al., 2015; Guo, Mays & Wang, 2017; Kim & Min, 2015)。萨德事件自爆发以来,由于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迅速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议题(龙梅兰&李盛龙, 2017)。

萨德,全称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美国的陆基战区反导系统,美国主张在韩国部署萨德,成为萨德事件的缘起。2016年7月8日,美韩两国正式宣布,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了我国外交部门的强烈抗议;2017年2月28日,韩国国防部与乐天集团签署了有关确保萨德部署用地的易地协议,随后我国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包括抵制乐天和旅游降温等现象;2017年3月6日起,萨德相关装备陆续运抵韩国;2017年5月10日当选的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曾在大选时多次承诺重新审议萨德入韩的决策,但执政后却采取“战略模糊”态度(刘辰辰&郭卓



娅, 2017; 吕春燕&徐万胜, 2017; 王子涵, 王玉辉, 王雷&王鑫, 2017)。萨德事件的相关议题/属性随着时间发生演化并持续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因而考察媒体和公众对此事件的议程和关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萨德事件成为在特定语境中、针对特定事件、检验议程设置理论的具体个案。为了检验第三层次议程设置,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研究问题一: 关于萨德事件, 我国媒体报道呈现出怎样的属性网络?

研究问题二: 关于萨德事件, 我国公众议程呈现出怎样的属性网络?

为了探析媒体和公众议程网络之间的关联, 本研究还进一步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来检验NAS效果:

假设一: 关于萨德事件的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与隐性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假设二: 关于萨德事件的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与显性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 三、研究方法

为了探析媒体议程网络与公众议程网络的关联关系, 本文采用了个案分析的方法, 以我国报纸对萨德事件的报道和公众对此事件的关注为焦点进行分析。与以往的议程设置研究传统一致(Wu & Guo, 2017), 本文收集了两组数据来分析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其中, 一组数据为关于萨德事件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 而另一组数据则是公众对于萨德事件看法的问卷调查。

#### (一) 数据收集

对于媒体报道, 本研究通过慧科数据库(WiseSearch6)进行数据检索。慧科搜索涵盖了国内数千份报刊, 并提供新闻检索和全文下载。本研究以“萨德”为关键词, 选定“报刊”为媒体来源并以“日报、早报、晚报及都市报、政府机关报、其他新闻报”为主要媒体类别, 以2016年7月8日(美韩正式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至2017年3月6日(萨德装备陆续运抵韩国)为时间区间, 在慧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共计检索到相关报道10811篇。其中, 发文量位居前五位的报纸为《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民晚报》和《南方日报》。综合考量相关报道的数量、报纸的影响力和地理分布等因素, 本文选定这五份报纸中的报道文章用于内容分析。经过二次检索, 清除“巴沙尔·阿萨德”等无关报道, 共计获得关于萨德事件的报道680篇全部取样进行内容分析, 其中《环球时报》341篇, 《人

民日报》87篇，《北京日报》94篇，《新民晚报》78篇，《南方日报》80篇。

本文内容分析以篇为分析单位，编码条目集中在报道中提及的关于萨德事件的属性。根据对取样报道的初步梳理阅读并基于前人研究（Cheng, 2016; Guo, 2012; Kim & McCombs, 2007; Wu & Guo, 2017），识别出30个关于萨德事件的主要属性，包括“危机”“反导弹”“国家安全”等（详见附录1）。由于网络分析的目标是识别出属性在同一篇报道中的共现，所以本研究采用了二元的编码方式来对30个属性进行编码，即一篇报道中如果提及了相关属性则编码为“1”，若未提及则编码为“0”。两位编码者首先对取样报道文章的10%进行了编码，计算出编码者间的信度为0.91（Hays & Krippendorff, 2007）。然后，两位编码者平均分配，依据编码表完成了所有取样报道文章的编码。

对于公众的态度，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隐性和显性的公众议程，在借鉴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Cheng & Chan, 2015; Guo, 2012; Paxman, 2011），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采用了思维导图法（mind-mapping approach）的设计。为了辅助问卷调查的设计，本研究首先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法收集了公众对于萨德事件的看法和表述。考虑到参与者的职业、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别，焦点小组的前置研究分为五组进行，以职业作为分组的主要考量，每组10人，性别均衡（焦点小组访谈的具体信息详见附录2）。基于焦点小组访谈中的叙述，研究者整理出一组公众议程中关于萨德事件的属性列表。经过将基于焦点小组访谈整理的属性与媒体报道属性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大量同义或近义的表述，因此经过整合最终与内容分析相同的30个词属性列表被用于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中。在问卷的思维导图法相关题目中，隐性和显性关联是分开测量的：参与者首先被要求从30个属性词列表中选择最多10个词汇用以描述萨德事件，而选出词汇的共现用以测量属性间的隐性关联；然后参与者通过连线的方式在自己选择的词汇中将其认为彼此关联的属性词汇用线连起来（Cheng & Chan, 2015），而连线则明确标示出属性间的显性关联。

问卷调查基于LimeSurvey平台发放，数据收取时间为2017年6月24日至7月26日，共计获得问卷564份，其中完整有效问卷为538份并用于数据分析。问卷调查参与者中197人为男性（37%），341人为女性（63%）；受教育水平方面，290人（54%）为本科学历；职业背景方面，18%为学生，66%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参与者主要为汉族（94%），少数民族的参与者占6%。

## （二）网络分析

媒体或公众议程反映了相关新闻报道或问卷调查参与者如何将关于萨德事件的不同属性联系起来,本研究通过网络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和比较媒体与公众的议程网络(Guo, 2012; Wu & Guo, 2017)。软件UCINET 6被用来进行数据的网络分析(Borgatti, Everett & Freeman, 2002)。在本研究分析的具体操作中,对于媒体议程网络和隐性公众议程网络而言,在同一篇报道中或同一位问卷调查参与者的反馈中任意两个属性的共现被认定为这两个属性之间存在关联,而显性公众议程则是由参与者主动连线标示出来的。

新闻报道或问卷反馈中相关属性的共现次数被计算出来用以测量任意两个属性间的关联强度。两个属性在同一篇报道或同一个问卷调查反馈中共同出现的频率越高,这两个属性之间的关联就越强。因为NAS模型的焦点在于元素间的相互关联,所以新闻报道和问卷调查中只出现单一属性的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在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形成了30行和30列的三个矩阵,分别代表着媒体议程与隐性和显性的公众议程中属性间的关联。矩阵中的每一行或每一列都代表着一个属性,每一格中的数值代表着相应两个属性间的共现次数,即关联程度。

### (三) 二次指派程序(QAP)

二次指派程序的方法被用来对媒体和公众议程网络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比较两个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和规格,QAP相关分析可以计算出两个矩阵间的相关程度(Krackhardt, 1987; 刘军, 2014)。与线性相关分析不同,QAP通过采用序列技术来解决双值的并元自相关(dyadic autocorrelation)问题,即矩阵中同一行或同一列中的观测值可能潜在彼此相关的问题(Borgatti, Everett & Freeman, 2002)。

### (四) 网络可视化

本文采用复杂网络绘图软件NetDraw来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生成议程网络的图示(Borgatti, 2002)。本研究采用迭代度量多维标度分析方法(Iterative 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来测绘每个网络图,一个属性与其他属性联系越紧密,则这一属性居于网络越靠近中心的位置;且属性之间的关联度越强,则这些属性在图示中越靠近彼此。

## 四、研究结果

### (一) 媒体与公众议程中萨德事件的属性网络

本文通过生成网络图来考察萨德事件中媒体和公众议程如何将不同的属性关联

起来。图中显示的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一个属性，连接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线段表示两个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线段越短则两个节点的关联越密切。至于特定属性的影响力，该属性越是居于网络图的中心位置，则其与其他属性的关联越多。

通过NetDraw对媒介矩阵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了关于萨德事件的媒体议程（见图1）。UCINET中进行点度中心性分析（Network > Centrality > Degree）的结果显示出一些属性占据了萨德事件媒体议程网络的中心，包括“朝鲜”（点度中心度为1151）、“政治”（点度中心度为950）、“朴槿惠”（点度中心度为692）、“抗议”（点度中心度为554）、“危机”（点度中心度为537）、“东亚”（点度中心度为448）、“国家安全”（点度中心度为380）、“中韩关系”（点度中心度为372）、“挑衅”（点度中心度为371）、“核武器”（点度中心度为331）、“国际关系”（点度中心度为313）、“愤怒”（点度中心度为274）、“抵制”（点度中心度为248）、“遏制”（点度中心度为248）和“理性”（点度中心度为217）。这说明在我国报纸关于萨德事件的报道中，频繁地将这些属性与其他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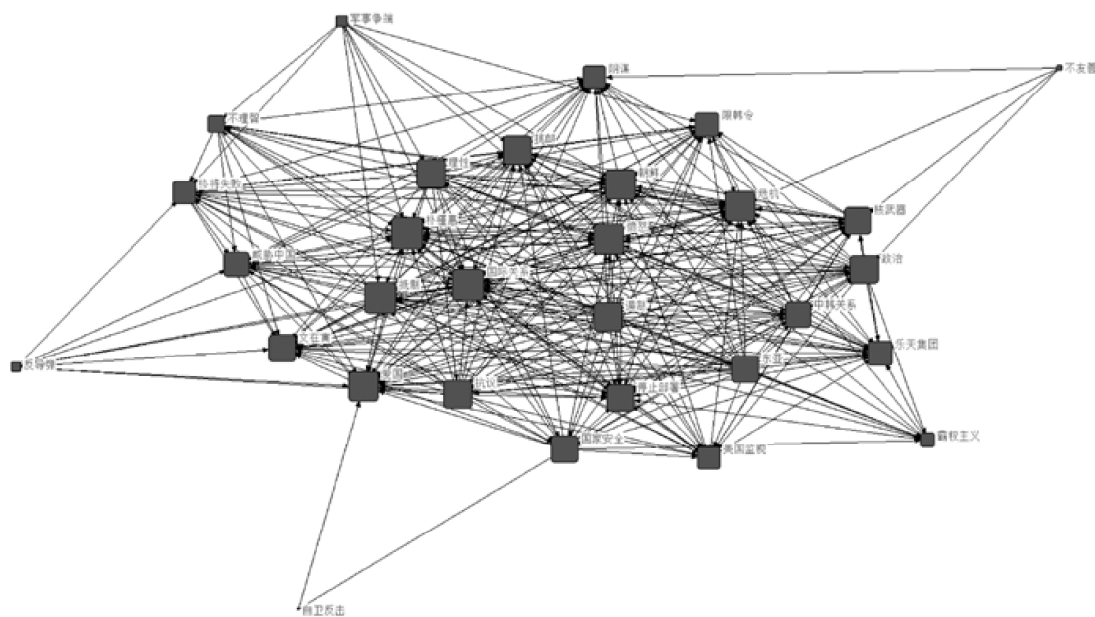


图1: 萨德事件的媒体议程

隐性公众议程矩阵的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了萨德事件的隐性公众议程网络（见图2）。根据UCINET中点度中心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关于萨德事件，居于隐性公众议程网络中心的属性包括“朴槿惠”（点度中心度为3278）、“威胁中国”（点度中心度为3227）、“乐天集团”（点度中心度为3188）、“国家安全”（点度



中心度为2923）、“中韩关系”（点度中心度为2795）、“限韩令”（点度中心度为2776）、“美国监视”（点度中心度为2569）、“国际关系”（点度中心度为2063）、“阴谋”（点度中心度为2040）、“停止部署/搁置”（点度中心度为1926）、“危机”（点度中心度为1879）、“抵制”（点度中心度为1694）、“爱国”（点度中心度为1413）、“朝鲜”（点度中心度为1395）和“反导弹”（点度中心度为1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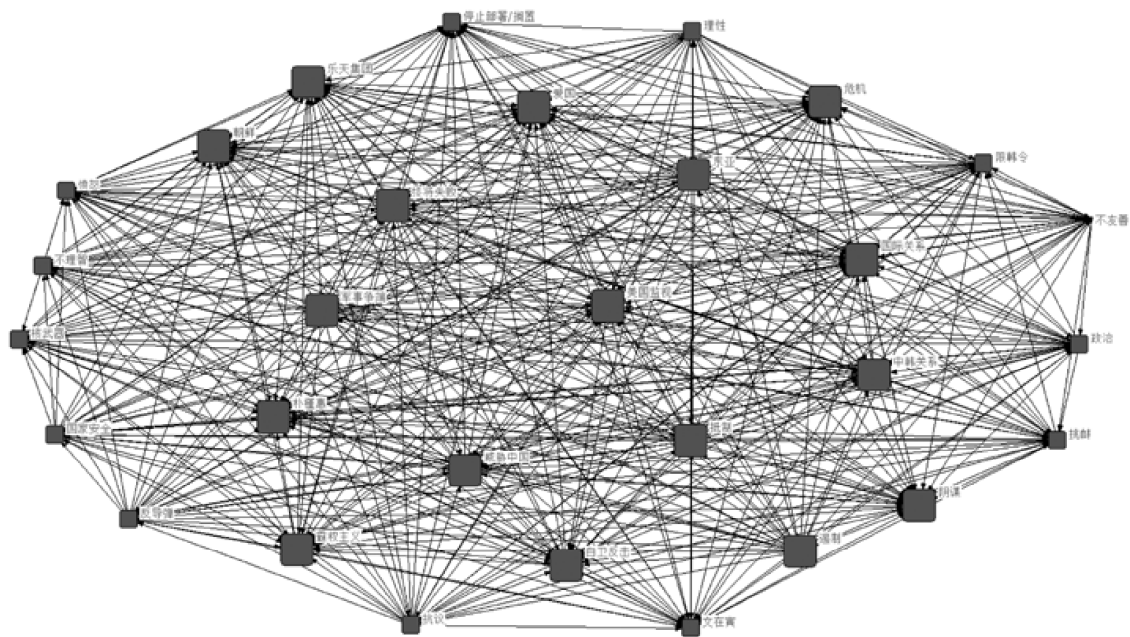


图2: 萨德事件的隐性公众议程

对显性公众议程矩阵的NetDraw可视化分析显示了萨德事件的显性公众议程网络（见图3）。可见，UCINET中的点度中心性分析结果显示，公众明确地将属性“威胁中国”（点度中心度为444）、“乐天集团”（点度中心度为393）、“中韩关系”（点度中心度为392）、“朴槿惠”（点度中心度为389）、“限韩令”（点度中心度为339）、“国家安全”（点度中心度为335）、“美国监视”（点度中心度为323）、“阴谋”（点度中心度为313）、“国际关系”（点度中心度为263）、“危机”（点度中心度为242）、“抵制”（点度中心度为201）、“停止部署/搁置”（点度中心度为194）、“爱国”（点度中心度为165）、“军事争端”（点度中心度为158）和“挑衅”（点度中心度为156）置于萨德事件议程网络的中心位置。

因此,通过比较媒体议程与隐性和显性公众议程的网络图可以发现相似的属



性居于议程网络的中心位置,包括“朴槿惠”“危机”“国家安全”“中韩关系”“国际关系”和“抵制”。三个图示直观地展示出萨德事件的议程网络,通过比较分析三个图示也显示了网络议程设置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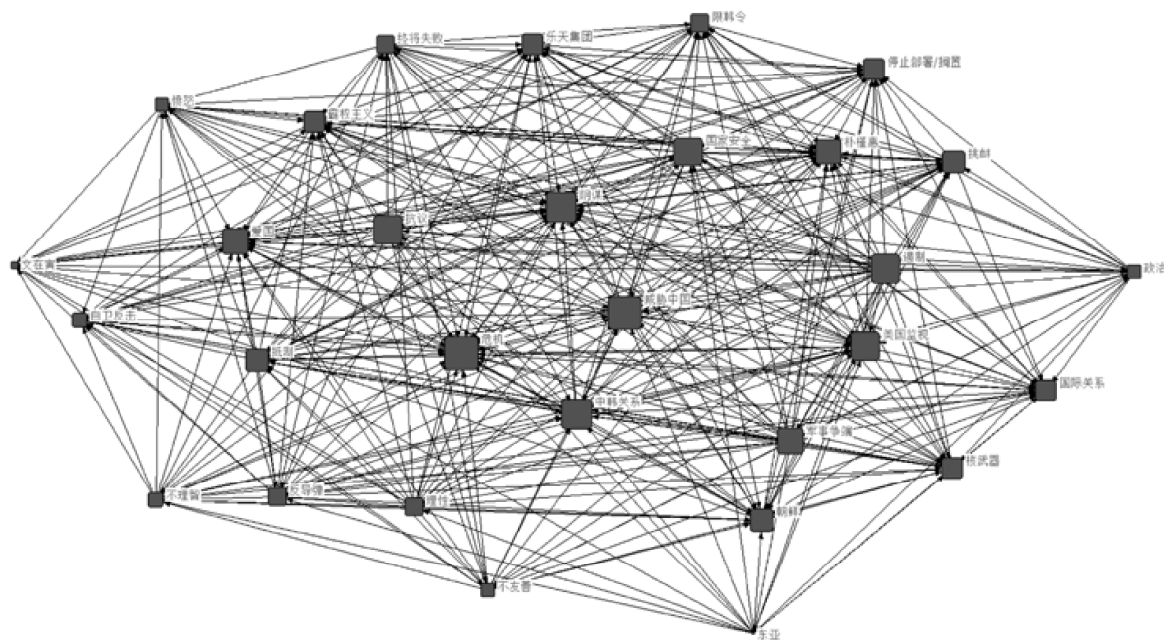


图3: 萨德事件的显性公众议程

## (二) 萨德事件中的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分析

QAP相关分析被用来检测媒体与隐性和显性公众议程网络的关联。根据表1结果显示,媒体与公众议程彼此显著相关。具体而言,媒体报道属性的议程网络与隐性公众议程网络( $r = .24, p < .01$ )和显性公众议程网络( $r = .18, p < .01$ )都呈现出正向的显著相关。结果显示出了NAS效果,即媒体议程对公众理解萨德事件的隐性和显性议程都表现出很强的议程设置效果。因此,本文的两个假设都得到了支持。

表1: 萨德事件中的网络议程设置效应

	萨德事件	
	隐性公众议程	显性公众议程
相关系数	r	r
媒体议程	.24**	.18**

注: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五、结果和讨论

作为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的网络议程设置是近几年来议程设置理论的最新演进,

尽管已在国内外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目前相关的研究仍十分有限。目前国内仅有几篇NAS相关的综述性文章（史安斌&王沛楠，2017；郗艺鹏，2018；杨璐，2017），尚无相关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对萨德事件的媒体和公众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实证分析，通过网络分析方法对议程设置研究的这一崭新思路在非西方的中文语境中进行检验与具体应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为验证网络议程设置模型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进一步考察了媒体报道到公众认知的显著性转移，并对隐性和显性公众议程进行了细分。

本研究响应了传播学研究应加强对语境敏感性（context-sensitive）的关注（Miike, 2007；Sparks, 郭镇之 & 周庆安，2015），进一步将现有的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的理论化延伸至对于非西方语境中特定国际事件的考察。自从1968年以来，尽管议程设置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分析西方社会背景下的不同事件，但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研究数量仍较有限，且仍集中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传统议程设置研究（Luo, 2014）。通过采用个案分析的路径，本研究考察了中国语境中针对萨德这一特定国际事件的议程网络，来检验第三层次的议程设置，对于拓展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理论的现有研究疆域具有一定的贡献。尽管与西方语境下的媒体政策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议程设置在中国语境下同样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由于结合了中国语境下的具体个案进行考察，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与现有的西方社会背景下的研究进行比较，以在一定程度上探析议程设置过程中政治、文化、国际关系、媒体景观等元素的作用（Blumler, 1983）。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尽管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影响的日益增长，对于萨德这样的重要国际政治事件的理解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在我国仍发挥着很强的影响力——我国报纸议程网络与公众议程网络之间存在显著且正向的相关性。后续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传统媒体、社交网络平台等数字媒体，以及公众之间复杂的议题/属性互动与影响（杨璐，2017）。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前人关于网络议程设置的研究，对第三层次议程设置中公众的隐性和显性议程进行了区分和考察。尽管认知心理学的观点为公众议程的隐性和显性做了理论区分和假设（Greenwald & Banaji, 1995；Guo, 2012），但目前关于公众隐性和显性议程的测量与分析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Cheng, 2016）。本文的一大贡献在于具体测量了中国大陆语境中公众的隐性和显性议程，而隐性与显性公众议程都与媒体议程高度一致的结果则有力地证实了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效果的存在，即在隐性和显性两种思维层面上，媒体议程网络都与公众议程网络呈现出正向的显著相关，进一步充实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杨璐，

2017; Cheng, 2016; Guo, 2012)。与前人的研究发现一致(Cheng, 2016), 媒体议程网络与隐性公众议程网络的关联要高于显性公众议程网络, 这表明媒介信息在公众头脑中进行有意识的信息处理后可能出现效果衰减, 因此与有意的、直接控制的显性公众议程相比, 媒介议程与无意识的、自动的隐性公众议程的相关程度更高。可见, 舆论引导过程中, 通过细分公众脑海中的隐性和显性思维模式及元素关联, 可以理解公众对信息的认知处理及其效果衰减, 从而更加细致地考察媒体在哪个层面、如何影响公众的思维, 以及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舆论引导(Cheng, 2016; Vargo et al., 2014; Vu, Guo & McCombs, 2014)。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 本文采用了网络分析法结合思维导图法的路径, 积极响应了麦库姆斯等采用更加严谨的方法来考察公众议程的号召(Guo & McCombs, 2011a, 2011b)。本研究聚焦萨德事件甄别出媒体和公众议程中的主要属性, 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思维导图法在公众问卷调查中的设计和应用。网络分析的结果显示出描述性的属性在媒体报道和公众头脑中是如何彼此关联形成网络的, 而QAP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出NAS效应的存在。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我国媒体和公众关注萨德事件的议题/属性——在媒体和公众的隐性与显性议程中“朴槿惠”“危机”“国家安全”“中韩关系”“国际关系”和“抵制”都占据了中心的位置, 显示出我国媒体和公众对于萨德事件的关注焦点和思维逻辑。相对于传统的议程设置而言, 网络议程设置表明媒体议程由输出意见到输出逻辑, 因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此类事件的媒体报道和舆论引导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郗艺鹏, 2018)。

诚然,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后续研究还可以将更多反映中国特殊情境的其他变量纳入考量, 如中国报刊的属性分类、萨德事件可能反映出的意识形态偏向等。前人的研究指出议程属性具有多维度的特点, 未来研究可以具体考察情感属性的议程网络, 还可以分析比较媒体议程中的正向属性与负向属性(Kiousis & McCombs, 2004; Wu & Guo, 2017)。由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采用的是自主参与的滚雪球抽样, 而非概率抽样, 本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推广为整个中国民众对萨德事件的态度, 而应将本研究的结果理解为中国语境下对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理论的检验(Chen et al., 2017)。后续研究可以通过更为理想的概率抽样, 更加精准地分析我国民众的普遍态度, 并进一步检验网络议程设置的效果。未来研究还可以将个人政治立场、话题认知水平等个体差异变量纳入考量, 议程设置的网络分析和个人层面的议程设置可以结合起来, 进一步考察个体差异在网络议程设置模型中的作用与影

响 (Roessler, 1999; Shehata & Strömbäck, 2013)。

(责任编辑: 束开荣)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刘辰辰, 郭卓娅 (2017)。国家事件议程建构的多元主义与公共空间——以新浪微博“萨德事件”话题为例。《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5), 269-271。
- 刘军 (2014)。《整体网分析: UCINET软件实用指南》。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龙梅兰, 李盛龙 (2017)。框架理论视角下新浪网“萨德事件”报道研究。《传媒观察》, (6), 23-25。
- 吕春燕, 徐万胜 (2017)。韩国国内对“萨德”入韩的认知与立场。《和平与发展》, (3), 49-62。
- 史安斌, 王沛楠 (2017)。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 溯源·演进·前景。《新闻与传播研究》, (10), 13-28。
- 王子涵, 王玉辉, 王雷, 王鑫 (2017)。一种基于社交媒体的突发事件话题演化分析系统研究。《信息网络安全》, (9), 98-102。
- 郝艺鹏 (2018)。输出逻辑: 第三级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启示。《青年记者》, (2), 4-5。
- 杨璐 (2017)。数字媒介时代议程设置研究新进阶——第三级议程设置。《新媒体研究》, (3), 27-29。
- Blumler, J. G. (1983). *Communicating to voters: Television in the first Europ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London: Sage.
- Borgatti, S. P. (2002). *NetDraw: Graph visualization software*. Harvard, MA: Analytic Technologies.
- Borgatti, S. P., Everett, M. G., & Freeman, L. C. (2002). *Ucinet for Windows: Software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arvard, MA: Analytic Technologies.
- Chen, Y. R., Hung-Baesecke, C. F., & Kim, J. (2017). Identifying active hot-issue communicators and subgroup identifiers: Examining the 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4(1), 124-147.
- Cheng, Y. (2016). The third-level agenda-setting study: An examination of media, implicit, and explicit public agendas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4), 319-332.
- Cheng, Y. & Chan, C. M. (2015). The thir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racking descriptions of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in media coverage and people's mi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 1090-1107.
- Cohen, B. C.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urtin, P. A. & Gaither, T. K. (2005). Privileging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power: The circuit of culture as a basis fo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7(2), 91-115.
- Greenwald, A. G. & Banaji, M. R. (1995).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 stereotyp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1), 4-27.
- Guo, L. (2012).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agenda setting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6(4), 616-631.
- Guo, L. (2015). A theoretical ex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 In Guo, L. & McCombs, M. (Eds.).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New directions for agenda setting* (pp.1-15). London: Routledge.
- Guo, L., Chen, Y. K., Vu, H., Wang, Q., Aksamit, R., Guzek, D., Jachimowski, M., & McCombs, M. (2015). Coverage of the Iraq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Poland. *Journalism Studies*, 16(3), 343-362.
- Guo, L., Mays, K., & Wang, J. (2017). Whose story wins on Twitter?: Visualizing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Journalism Studies*, DOI: 10.1080/1461670X.2017.1399813.
- Guo, L. & McCombs, M. (2011, May). *Networked agenda setting: A Third level of media eff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CA annual conference. Boston.
- Guo, L. & McCombs, M. (2011, August). *Toward the thir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 theory: A Networked Agenda Setting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EJMC annual conference. St Louis.
- Hayes, A. F. & Krippendorff, K. (2007). Answering the call for a standard reliability measure for coding data.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1(1), 77-89.
- Jochen, P. (2003).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s contingent conditions of agenda setting: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polarized elite opin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683-712.
- Kim, K. & McCombs, M. (2007). News story descriptions and the public's opinions of political candidat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4(2), 299-314.
- Kim, J. & Min, Y. (2015). An issue attention cycle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 In Guo, L. & McCombs, M. (Eds.).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New directions for agenda setting* (pp.132-143). London: Routledge.
- Kiousis, S. & McCombs, M. (2004). Agenda-setting effects and attitude strength: Political figures during the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1), 36-57.
- Kosicki, G.M. (1993).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agenda-set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2), 100-127.
- Krackhardt, D. (1987). QAP partialling as a test of spuriousness. *Social Networks*, 9, 171-186.
- Lang, A. (2000). The limited capacity model of mediated message process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1), 46-71.
- Luo, Y. J. (2014). The Internet and agenda setting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media coverage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24), 1289-1312.
- McCombs, M.E. (2005). A Look at Agenda sett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ism Studies*, 6(4), 543-557.



- McCombs, M., Llamas, J. P., Lope-Escobar, E. & Rey, F. (1997). Candidate Images in Spanish Elections: Second-Level Agenda-Setting Effec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4), 703-717.
- McCombs, M., Lopez-Escobar, E. & Llamas, J. P. (2000). Setting the agenda of attributes in the 1996 Spanish gener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2), 77-92.
-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2), 176-187.
- McLeod, J. M., Becker, L. B. & Byrnes, J. E. (1974). Another look at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the pre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 131-166.
- Miike, Y. (2007). An Asiatic reflection on Eurocentric bia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4(2), 272-278.
- Paxman, C. G. (2011). Map your way to speech success! Employing mind mapping as a speech preparation technique. *Communication Teacher*, 25(1), 7-11.
- Roessler, P. (1999). The individual agenda-designing process: How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gocentric networks, and mass media shape the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issues by individual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6), 666-700.
- Rogers, E. M. & Dearing, J. W. (1988). Agenda-setting research: Where has it been, where is it going?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1(1), 555-594.
- Shehata, A. & Strömbäck, J. (2013). Not (yet) a new era of minimal effects: A study of agenda setting at the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level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8(2), 234-255.
- Stephen, K. (2005). Cognitive Maps in Perception and Thought. In Downs, R. M. & Steaeds, D. (Eds.). *Image and Environment: Cognitive Mapping and Spatial Behavior* (pp. 63-78). Chicago: Aldine.
- Sparks, C., 郭镇之, 周庆安 (2015)。新闻事件与媒介研究。《全球传媒学刊》, 2 (1), 97-105。
- Vargo, J. C., Guo, L., McCombs, M. & Shaw, D. L. (2014). Network issue agendas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2), 296-316.
- Vu, H. T., Guo, L. & McCombs, M. (2014). Exploring ‘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 A network agenda-setting stud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1(4), 669-686.
- Walgrave, S. & Aelst, V. P. (2006). The contingency of the mass media's political agenda setting power: Towards a preliminary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1), 88-109.
- Whetten, D. A. (2009).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ntext and theor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1), 29-55.
- Wu, D. & Guo, L. (2017). Beyond salience transmission: Linking agenda networks between media and vote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OI: 10.1177/0093650217697765.

## 附录1: 30个属性的定义

序号	属性	定义
1	朴槿惠	第18届韩国总统朴槿惠（前任）
2	危机	由萨德事件引发的各种危机
3	阴谋	部署萨德存在其声称原因之外的阴谋
4	停止部署/搁置	停止或暂停萨德的相关部署进程
5	文在寅	第19届韩国总统文在寅（现任）
6	爱国	我国民众在反对萨德事件过程中表达出的爱国情绪或言论
7	国际关系	萨德事件对国际政治或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8	朝鲜	朝鲜作为国家或朝鲜的官员
9	乐天集团	乐天集团在韩国或中国的门店、员工、网站等
10	霸权主义	部署萨德是霸权主义的行径或表现
11	自卫反击	为回应萨德带来的影响或损害而采取的反击行动
12	限韩令	相关部门对韩国娱乐节目、明星活动、赴韩旅游出行等的限定
13	愤怒	萨德引发的相关国家政府或民众的愤怒表达
14	挑衅	部署萨德是对相关国家的挑衅
15	核武器	朝鲜半岛的核武器问题
16	美国监视	美国通过部署萨德对朝鲜、中国、俄罗斯等进行监视
17	威胁中国	萨德对中国的安全威胁
18	中韩关系	萨德事件影响中国与韩国的两国关系
19	终将失败	关于萨德事件最终结果必将是失败的讨论和评述
20	政治	萨德事件在政治层面的影响
21	不理智	部署萨德是不理智的
22	国家安全	萨德事件相关的多个国家的战略安全问题
23	不友善	萨德的部署是不友善的表现
24	反导弹	萨德反导弹系统或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可对导弹进行拦截
25	抵制	对部署萨德的抵制言论或行动
26	抗议	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反对萨德的抗议或游行
27	理性	反对萨德过程中对理性或克制的强调或推崇
28	东亚	整个东亚地区或特定的东亚国家
29	军事争端	与萨德事件相关的军事争端
30	遏制	通过部署萨德对相关国家进行的遏制

## 附录2: 焦点小组访谈具体信息

焦点小组访谈	参与者人数	职业	性别	年龄
第一组	10	学生	5男、5女	18~25岁
第二组	10	公务员、事业单位	5男、5女	29~46岁
第三组	10	国企	5男、5女	26~38岁
第四组	10	私企、外企、个体	5男、5女	22~33岁
第五组	10	待业或无业、退休	5男、5女	48~62岁